论《巷战之夜》的现实主义意义

张一莉 张一骐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素有爱国情怀的张恨水先生深感在自己的岗位上，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小说家，他认为“今国难当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1），所以“写任何小说，都想带点抗御外侮的意识进去。”（2）可见，这个时期他的创作观、文学观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通过要“赶上时代”的自我反思，已逐步摒弃“小道”的旧观念，认识到文以载“大道”的意义与责任。“七·七”卢沟桥的炮火，更促进他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集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938年5月，张恨水在武汉被推为由茅盾、郭沫若、老舍等4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嗣后，他的创作目的、文学主张更有了质的变化。抗战期间，他创作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前期多以揭露日寇凶残，鼓吹抗战为目的；后期多以揭露国统区腐败黑暗，反对破坏抗战为宗旨。于1939年创作发表，曾先后三易其名的小说《巷战之夜》就充分体现了张恨水前期抗战小说的宗旨，在他的抗战军事小说中颇有代表性，分析《巷战之夜》的现实主义特点，藉以研究抗战时期的张恨水，是有认识意义的。

一

《巷战之夜》主要内容是：1937年7月下旬，天津即将沦陷，局势一片纷乱。日机低空轰炸，当局一味退让，兵士力求一战，市民惶惶，心态各具。28——29日，中日军队发生激战，日机更加疯狂地轰炸城市，扫射民众，津门惨遭摧残。敌人的暴行，炸起了中国男儿的怒火，以教师张竞存为代表的老百姓，自发组织月下劳军，正好遭遇一队日军，他们毅然举起大刀锄锹，与敌人展开巷战，取得了杀敌79名的胜利战果。张竞存撤离天津后，到大别山当上了游击队支队长，在天津巷战周年纪念日，他率领游击队又打了一场漂亮的夜袭巷战。但在天津巷战两周年纪念日，他在抗战陪都重庆见到的却是另一种“巷战”——达官贵人喝酒、听戏、打麻将……张竞存凝望着月亮默思：“一切瞒不过你，你知道人世间是怎样回事?”

这篇直接描写日寇血腥屠杀，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小说，作者曾三次更名。他在小说的“序”中写道：“民二八年，友人编《时事新报》的青光，要我写小说，我就写了这个长篇，题目原来是《冲锋》。次年《前进日报》转载，我又改名为《天津卫》。前者是说故事里冲杀一切，后者是说保卫天津，而北方人叫天津，根据历史的习惯，是叫天津卫的。略有双关之意。……近来(指1941年——笔者注)后方朋友鼓励我多拿旧稿出书……便改名为《巷战之夜》以便出版。但因这一改，又感到篇中故事，于巷战、于夜，未能发挥尽致……就在全文之上，加了第一章与第十四章，按着一头一尾。我不敢说这是画龙点晴，仿佛这就多了一点曲折。”这段自述，道出作者易名增写的良苦用心，旨在不断拓展小说的主题内涵。从1939年到1941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作者对小说的着眼点由赞美冲锋在前的壮士，到鼓吹面对敌人的屠杀，民众拿起武器，奋起抗战，保卫自己的家园，再到讴歌敌占区游击队员浴血战斗，鞭鞑国统区官僚贵族醉生梦死的丑行，结尾含蓄而明白地给读者点出这是抗战时期又一幅“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关山月下图”。《巷战之夜》创作思路不断地开拓，创作思想不断地深化、小说主题不断地升华，这表明了当时的张恨水已抛弃了他前期创作的“趣味主义”，以“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顺应时代风云的急骤变化，以表现爱国主义，鼓励抗战为创作方向，伸张正义，鞭挞黑暗，干预人生；力求能较为准确、真实地反映民族存亡重要关头的社会生活。

尤其要注意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施行法西斯高压手段，提出了文学创作的“六不政策”，其首条即是“不去写社会黑暗”（3）；而与此前后，作者的几篇描写游击队的小说，如《潜山血》《前线的安徽 安徽的前线》《游击队》等都因与统治者的政治作风不对而遭腰斩。就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坚定地说：“写游击队有什么不对呢?我更积极地搜罗材料”，“我得着许多游击队的消息，又鉴于大后方豪门的生活令人愤慨。于是我在书前书后各加上了一段(指张竞存领导游击队进行巷战和重庆所见“巷战”——笔者注)，将书名改为《巷战之夜》。”（4）显示了作者敢于公然冒统治当局大不韪的决心与行动。与三十年代初作者曾自叹的，因政府不许公然反抗日本，他“所心响的抗侮文字也就吞吞吐吐，出尽了可怜相”（5）之情况相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作家，张恨水的认识觉悟、斗争态度确确实实在跟随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潮流不断进步。因为他在高压下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使他的作品能较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二

《巷战之夜》中，作者满怀赞美之情塑造了张竞存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张竞存是个深爱祖国的普通教员，面临国破家亡，他不甘坐以待毙，送走妻儿，留在危在旦夕的天津，就是要“做些工作”。在局势混乱，“议和”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他也曾彷徨，无所适从；但他通过对市面和租界的实地观察和认真分析，认为“难下和谈的结论”。对形势正确的认识使他在惶恐不安、心态各异的人群中，显得出众地清醒与镇静。他痛斥投降派企图组织维持会的汉奸主张，劝说动摇者丢掉屈和的幻想：“中国打败了，全中国都成为奴隶，老先生们希望的苟全，一定是一种泡影。”中国士兵奋力抗战的行动激励了他的勇气和决心，他动员涣散、胆怯的街坊们：“放着现成的路不去努力，只管唉声叹气，这不是办法”，“人家在打仗，咱们送点吃的喝的，堆堆沙包，筑筑战壕，这都算帮了忙”。在他的带领下，群众勇敢地走上鏖战的街头。巷战肉搏中，张竞存一扫书生气，“随着杀呀之声，人是不知不觉地发了疯一般，飞步上前”，凭着学过武术，举着大刀左右拚杀，“自己也不知勇气是哪里来的，月下一条白光，在面前落到敌人身上，敌人就随刀落”，他带着伤立下了汗马功劳……一年后，他作为敌后游击队支队长，战前动员时，他极富鼓动性地现身说法：“我本不解打架，更不会杀人，自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马路巷战之后，我换了一个人，锻炼出我全身的气力，全副的胆量。荣誉之夜……并不是天生的，到了明年今夜，也许各位的成绩，比我强得多呢。”这时的他在弹火硝烟中沉着机敏，指挥若定，“将巷战看得很平常”了。抗日斗争的锻炼，使张竞存由一个普通教员成长为一个着于宣传群众，善于谋划指挥战斗，也善于思考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杰出的抗日志士。三次巷战，勾勒出他逐渐成熟的历程，而他的形象通过多种描写手段也更见丰满、真切。

张竞存身上显现着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正气、骨气与阳刚之气，被张恨水称为“颇有‘懦夫立’的意味”（6）。可以说，张竞存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抗战理想，是体现作者在那个历史时期创作的审美观、英雄观和价值观的一个典型人物。尽管，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张竞存之所以能“懦夫立”，除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和时代斗争使然外，小说中对其政治态度、思想基础交待得并不多，这大约与作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有关；但如探讨其写作背景、素材来源，即能从中体味出作者遵循的写实原则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巷战之夜·序》中作者写道：“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我一个极为关切者的经历”，这位“极为关切者”就是他非常疼爱的四弟张牧野。张牧野原是北平北华美专的教务主任，是农工民主党早期成员，当时他正奉北平抗日组织之命在天津联系学联，准备成立学生请愿团，反对天津当局对日妥协投降。1937年7月28日，日机大肆轰炸天津，目睹敌寇暴行，张牧野和住在五马路的教师义愤填膺，即组织学生、居民劳军；见天津守军（国民党29军）人少力寡，即自发地参加其大刀队，与日军展开了英勇的巷战，身负二处刀伤。天津沦陷后，张牧野辗转至南京与张恨水会合，他力劝张恨水卖掉办报机器，买武器回潜山老家打游击。张恨水极为赞同，当即呈文给南京政府第六部以求承认合法，谁知泥牛入海。张恨水终因请缨无门，只得入川。1938年5月张牧野即奉农工民主党之命，在大别山拉起百余人的队伍，当了一年多的游击队支队长，打了几场漂亮战。国民党安徽省府对游击队深为不满，设计骗张牧野下山并以“异己分子”罪名关押一年多，1940年游击队被迫解散。

作为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张牧野和当时许多热血志士一样，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在祖国救亡运动中，自觉地承担起匹夫之责，他的经历在伟大的抗日大湖中只是一朵小浪花。但挚爱他的兄长张恨水，出自博大的爱国情怀，出自自己从戎未果的深深遗憾，对兄弟由“百无一用”的书生而终能“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山万里图”（7），感到由衷的关切与欢欣。尽管重庆与潜山远隔千山万水，战时音讯难通，他仍千方百计搜罗游击队的材料,了解兄弟们的信息(他的三弟张仆野也在游击队中)。张恨水在将张牧野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天津巷战内容是由张牧野亲述的——笔者注)“点染”成文时，对文中的主人公张竞存倾注了满腔赞誉之情，描写细腻朴质，形象丰满，有层次，表现其克服惶惑软弱，由忿恨仇敌到自发劳军，再到奋起抗战，直到成为一名成熟的游击队指挥员的成长过程也令人可亲可信。张竞存这个典型形象得到一些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的关注与较高评价，唐弢、严家炎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赵遐秋、曾庆瑞所编《中国现代小说史》，袁进的《张恨水评传》中都有提及。这固然是因张竞存代表着一批由自发到自觉走上武装抗日道路的有觉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抗战前期我国小说创作中较有影响的一批典型形象比较，亦有特色；同时大约也是由于作者对张竞存原型的政治态度、思想追求、性格特征、人生经历有着全面深刻的理解，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独到的观察角度和刻画力度，使之生活在千万个普通人之中而又呼之即出，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的缘故。

张恨水在其抗战军事小说中，特别喜欢表现“游击队”，而且这些游击队在其笔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坚持敌后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8），故常遭国民党当局的腰斩，对此作者坚定的回答：“我决不因未能写完而灰心。相反的，我更积极地搜罗材料。”（9）这除了充分表现作者讴歌敌后抗日志士的一片热忱和不屈的决心；是否也寄寓着作者对自己正在浴血斗争的兄弟及其战友们的深切挂念和崇敬追慕之情呢?小说中游击巷战的描写是作者想象的，但这种想象与同时期出现，受到一些进步作家严厉批评的“抗战八股”小说中全凭杜撰的战斗情节是不同的。因为张恨水当时写游击队战斗，“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根据”。（10）这种不凭幻想写作是基于他对各种抗战事迹、游击队斗争情况等有关素材精心地、多渠道地搜集，基于他对游击队员的了解与理解，也基于他对游击抗战武装抗战始终不懈地追求。他对游击队(群众自发的或以别的形式组织的，不含共产党领导的)的想象和表现可能有些美化，这与他的思想认识的局限有关；但对游击队斗争情况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艺术创作的真实的，尤其《巷战之夜》里后加上的游击队夜袭源潭铺寨子的一段，不仅符合张竞存思想行为发展的轨迹，也符合山区游击战的基本特点，为小说主题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延伸深化，增添了有力的一笔。

从生活中的张牧野到小说中的张竞存，经过作者对人物原型艺术的提炼、概括及加工，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比生活中具体的“个别”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也就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他的意义在于“把生活中的细小而可见的现象凝集为统一而巨大的形象，把生活中的萌芽而稀有的现象扩大为鲜明而突出的形象”(以群语)，即在国家存亡攸关的时刻，中国普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慷慨奋战的精神与气概。他们也是国家的“民魂”，是民族长城永不倒的坚强柱石之一，今天读来，仍有较强的感染力和现实教育作用。

三

《巷战之夜》的现实主义意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天津将陷落时那一角落的现状”（11）这是小说中典型人物性格发展的典型环境，小说通过张竞存的耳闻目睹和亲历，多方位、多场景动态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事件情景、民众心态及其变化。当北平已沦陷，天津的周遭，包括天空全被日军武力控制，他们的“坦克、装甲车在市政府前面耀武扬威”时，政府当局只会强令军士“别乱动”；日军占领了警察署，警察则是“一点抵抗也没有，就退出来了”。政府的无能、妥协，给百姓们造成极度的惶恐：“除了托庇租界外，全不知命在何处”。面临危局，小市民的一盘散沙，麻木苟活、互斗内耗的劣根性也充分显现；有家产的陈先生们，只会抱紧装满契约的皮箱，带着家人作丧家犬状，一味鼓吹“只有屈服再说”，卖苦力的小三子对国势无动于衷：“亡了国活该，我还拉我的车！”但对同伴的排挤却一刻不忘；帮工小马听见炮弹声只知躺在墙根下，腿软得迈不动却以为“炸飞了”；保姆刘妈吓得跪地拜求“救苦救难观世音”，他们和满街逃难的人一样只求能活一条命……然而站在这些可悲可叹小人物对面的，却是另一批高大昂立的中国人，譬如周班长和他的弟兄们、巡逻的警士、赶来救援天津的战士，他们都是国民党下级兵士，他们斗争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管上头命令怎样，我们决计不投降。”“不要以为日本人这样一来，就把天津拿去了。他们拿不了，天津永远是我们的。”他们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将委屈咽下肚子”，忠于职守，寸土不让。尤其是周班长，有勇有谋，成功地指挥了一场军民共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巷战。小说还刻画了一位平凡而可敬的老船工，为了使更多群众脱离险境，他和儿子不惜性命，不计分文，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摇船过渡，“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形形色色的人物，各具性格特征的心态和言行，作者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山河飘零，民族危难中的津门众生相。它是主人公张竞存生活的社会环境，这些栩栩如生的群像烘托了张竞存的性格特征与典型作用，是他性格变化发展的铺垫与基础，也是小说主题思想的起点。但这远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那个非常时期现实生活的全部。

《巷战之夜》中，作者多处记实性愤怒地记下了日机1937年7月28日对天津民众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的情景：“天刚亮，(敌机)仿佛在半空中排着走马灯似的……约莫一个小时以内，所听到的炸弹爆炸声，总有五十次以上”；“敌机卜卜一阵机关枪响，那拥挤在路头的人，好象颓墙上的乱砖，一个跟一个地向地面直倒，而在敌人看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娱乐……第二次、第三次绕着圈子过来，到了马路头上，更向下飞，人的手伸起来几乎可以抓到飞机……”；“随着飞机的影子，从地面上闪电似地掠了过去，早有几十个人应着飞机翅膀呼地一声惨响，躺在地上……不到五十步路，死尸和受伤的，一个挨着一个躺着，就塞满了道路”；“十字路口烧着房屋，已有四个火头……天气又热，人在一里路外都觉得火焰炽人。但一部分人，还向火焰奔去……有人蹲在地上，对受伤的乱叫，有的搂着地下死尸，号啕大哭。最凄惨的，是娘打死了，刚会走路的孩子，牵着死人衣襟哭叫，还有小孩子打得血糊周身的，娘倒是抱着在满地打滚”——读着这些令人齿寒心颤的文字，目前交叠着那一幕幕充满血腥味的特写，这不啻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稍有血性的中国人能不拍案而起吗?小说表现的重心正是敌人的杀戮罪行唤起了民众的自尊、自强：“咱们和小日本，没招没惹的。他烧咱们的房，又对咱们老百姓用机枪扫射，咱们真是那么容易欺侮吗?哼也不哼一声呢?”“一块儿投军去！”“咱们下乡当游击队去!”小三子腰别利斧要砍小日本：“这样做亡国奴，我不干!”“你们干什么我都算一个”；小马也认识到，“害怕有什么用?光害怕是躲不了飞机的。……当游击队，我就想去。”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与斗志，这些普遍民众才能在张竞存的宣传动员下，在周班长们英勇斗争精神的激励下，克服胆怯，克服涣散和自私，连陈先生也拿出食品自愿地去慰劳抗日的兵士。遭遇敌人时，谁也不肯“躺下装死等着挨揍”，而是平生第一次勇敢地举起刀锄。“在窄狭的战地上，反是短小轻便的铁锄大刀，挥动自如，敌人拿着枪挡了正面，左右两方却有十几把锹镐在月光下飞舞了来，敌人只有且战且退……老百姓原来以为求生不得，只好厮拚，并没有希望打多大的胜仗。现在看到日军纷纷败退，原来他们的力量也不过如此，就一同冲杀出来，各人拿着手上武器，各打一个日兵猛扑了……”经过巷战的洗礼，兵民们充满了民族的豪情，激励着主人公终于走上了武装抗战的道路。这些描写正符合恩格斯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即“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典型环境意义在于中国大众在爱国主义旗帜下，面对外侮，表现出民族共同的意志、信念和凝聚力、抗争力，使张竞存存在此中更具有广阔深远的概括意义。

这些白描的片断，生动地再现了七十年多前天津五马路上发生的一切。作家用他那充满悲愤、义愤、激奋的笔触，将历史真实的一瞬，永远定格在艺术的再创造之中。小说将纷纭复杂的情节、细节融合在各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中，融合在细致入微，令人如临其境的情景描写之中，读者在阅经历史沧桑后重读《巷战之夜》，仍感其现实主义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者并未亲睹，更未亲历刀光剑影，弹矢飞鸣的巷战，但小说中大段的描述，却是进退布局脉络清晰，招式了然合情入理，令人感到真切、撼人，能激起人强烈的情感共鸣，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作家丰厚的生活积累和非凡的想象力。

由此，我们看到了张恨水这位二三十年代国人皆知的通俗言情小说大家已突破了以往的“自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解决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努力地扩大现实生活的接触面，扩大创作实践的范围，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复杂的现实生活，再现了抗战时期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注 释：

（1）（2）（4）（5）见张恨水《我的写作生活》。

（3）见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

（6）（9）（10）见《巷战之夜·序》。

（7）见张恨水《弯弓集》。

（8）见袁进《试论张恨水抗战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意义》。

**作者简介：张一莉，女，张恨水侄女；张一骐，张恨水侄子。**